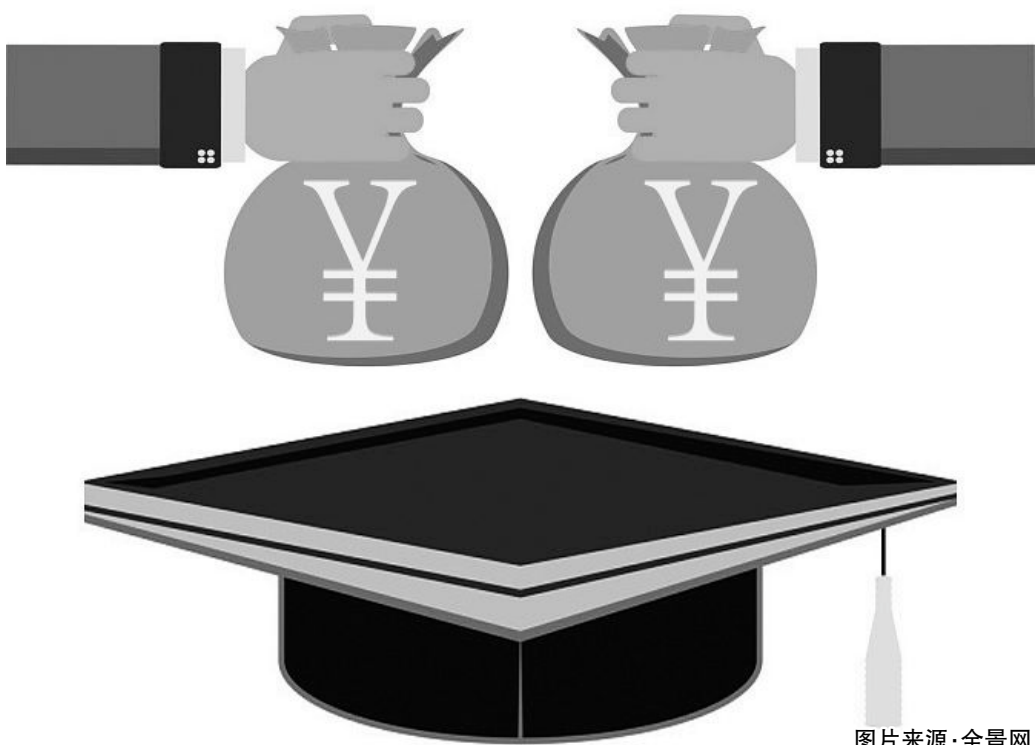


民校并购：资本狂欢后的育人之忧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图片来源：全景网

这阵子，民办高校并购在我国高等教育界“一石激起千层浪”。据透露，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港股民办教育公司就完成收购了7所民办高校。

10月5日，民生教育宣布收购励德集团51%股权，由此获得滇池学院管理权以及100%净利润。

9月26日，中教控股公布完成收购广州松田大学及松田学院。

早前，新高教集团公布收购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广西钦州英华国际学院、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由民生教育集团下属公司重庆悦诚、河北工业大学合办。

也许是因为民办教育一贯的话语弱势，这颗“石子”激起的“浪花”仅被外媒、国内财经媒体捕捉到。然而，中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市场，通过并购完成民办高校的聚合并非小事。那么，这场并购潮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送审稿》是并购的催化剂

“资本天生就有扩张的冲动。”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指出，如今，我国已有二三十家在境外上市的教育企业，它们必须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实现利好，获得市场影响力，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就在8月10日，司法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被不少人视作是此次并购的导火索。

《送审稿》中若干规定，在举办者中引起较大的争议。比如，第5条外商能否投资民办教育；第12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不得进行集团化办学；第45条限定民办学校的关联交易。

“由于监管部门的政策还没到位，存在一段空窗期，正式条例出台之前所进行的并购，被圈内称为‘最后的疯狂’。”董圣足说。

然而，并购并非一蹴而就。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并购的行为仅仅通过不到2个月的时间准备，显然难以完成，前期必然有意向及相关准备，因此并购是发展过程中的既定步骤，只是在《送审稿》的催化作用下加快了进度，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巧合。

提到并购的另一个动因，就不得不说201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2016年修订版)》)对民办高校实施分类管理，要求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中作出选择，政府根据所作选择进行相应的管理与扶持。

董圣足表示，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对前景感到困惑的举办者，不愿意在营利与非营利之间做出选择，于是便在现有条款变更前，将资产通过并购的方式“贱卖了之”。但这部分群体仅为少数，并非主流。

高教是一块大蛋糕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是一块大

蛋糕。

据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显示，中国民办高校产业已从2012年的696亿元稳步增至2016年的954亿元，并有望在2021年增至1390亿元。

尤其是《民促法(2016年修订版)》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投资者对政策障碍有所顾虑，而高等教育并没有如此规定，民办高校更进一步走入了他们的视线。

“并不是说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就没有了商业价值。”吴华解释，以集团化的幼儿园、中小学为例，被界定为非营利性只是意味着不能直接从学校进行节余分配，但是当该集团拥有成百上千的学校、上万的学生，就可以产生其他的消费需求、社会影响力，而这些都是具有商业价值的。

“投资者看中高教市场，更大的原因在于，高校的特点是规模大，更易产生市场影响力。”吴华解释，一所民办高校通常有上万名学生，每名学生收费为1万元至1.5万元不等，如果按照其所公布的50%利润计算，光一所民办高校就有上亿元利润。“一所高校的利润相当于几十所中小学。”

而且，高等教育的门槛相对高，并不能轻易介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的民办学校接近18万所，其中学前教育有16万所，中小学大约1.5万所，而高校仅有700多所。

吴华表示，正是由于专业化程度高、管理难度大、运营复杂性高、投资门槛高，高校办学形成了天然壁垒。也因此，并购一所中小学不会有太大影响力，而并购一所高校更容易产生投资者所期待的市场影响力。

此外，相比较中小学，高校办学许可证是稀缺资源，由此产生的附加值也是投资者看中的。

并购使得投资者无须再走复杂的办学许可程序，就可以获得一所高校的办学权。

资源优化是一大期待

那么，此番并购又会给民办高等教育带来什么？

董圣足指出，从短期来看，对于运行不好、资金存在困难的民办高校会有激励效应，有助于帮他们渡过难关；对于快速扩张的民办高校，本身存在融资的困难，通过资本对接可以推动高校的基本建设，有的高校上市以后，随着资本注入，能够使得教师的待遇有所提高。

在吴华看来，并购有助于提高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集中度，使得民办高校提升品质有了新的可能性。比如，原来提高办学质量发生在一所高校，现在有可能发生在一个集团下的多所高校中。

董圣足补充，集团化经营在总体发展、内部衔接、资源共享、品牌建设、要素优化等方面都有一定优势。比如，它可以集中采购降低物流成本，通过内部协作减少对市场的过度依赖，形成资源共享的比较优势。

而就并购双方而言，从常理上来说，投资者更愿意并购优质资源，但优质资源价格更高，被并购方也未必愿意，而劣质资源想退出市场，往往开价较低，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由于存在变为负资产的可能性，未必被人看中。

“通过并购会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这在中发展一定会显现出来，不管并购的是优质资源还是劣质资源，不管优质资源是否被并购成功，都会使其本身变得更强，资本层面使得竞争深化，将有助于民办高校的发展。”吴华说，然而，就

目前而言，由于并购相对于高校总体体量而言较小，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影响有限。加之，高等教育办学的复杂性，能否按理想发展尚未可知。

“总之，并购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但并不是民办高校发展的必经之路。”吴华表示，不并购高校自身也可以实现发展，但因为资本的介入，使得它必须采取并购的方式，否则无法应对资本市场的业绩压力。这也是现阶段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一大挑战。

成本转移是最大隐患

“心思都不在高校的内涵发展，而在外延扩张上；心思都不在高校长远持续发展上，而是在选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最大限度保障个人权益上。”这是不久前，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所表达的担忧。

董圣足指出，在探索并购之路的同时，应该看到上市企业给予民办高校的资金不是投资，而是负债，如果经营不善，势必会让高校的未来债务负担沉重。同时，从上市公司发布的业绩来看，民办高校的毛利率高达50%~70%，“羊毛”薅得如此厉害，留给高校的积累较少，这对于高校的长远发展并不利。

“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民办高校举办者过度地把盈余通过购买服务关联交易的方式转出去，导致高校节余少、成本高，真正用于教育教学环节的占比下降。”董圣足说。

实际上，早在《民促法(2016年修订版)》出台前，不少举办者并没有把真实意愿表达出来，都声称是非营利性、公益性办学，而真正让他们做选择的时候，初衷便显露出来，还是有相当的举办者有强烈的经济动机的。

董圣足告诉记者，究其原因，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权并没有完全落实，并购之所以快速发生，都是公司和高校举办者在企业层面进行股权交割，并没有涉及高校内部资产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当今监管的一大盲点。

一方面是高校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是办学者的利益。双方的矛盾集中爆发在《修改稿》第12条“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加盟连锁、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上，这也成为条例修订中最大的争议话题。

董圣足指出，随着民办高校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分开，教育部门所能做的事是不允许并购，而是管理好高校，把高校的财务控制好、资产保全好。而其他通过协议控制等形式到境外上市的教育企业，则不是教育部门能够单独监管的，需要多部门齐抓共管才行。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要出台更多的政策，简化转设中的政策障碍，使得举办者能够较为轻松或低成本地作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法人选择，确保举办者的前期投入得到较好的兑现，这样举办者才会有更长远、稳定的预期，不至于动辄采取短期行为。

“关键在于，举办者自身的办学理念，如果是为了集团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校的要素重组、资源优化，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发展战略；反过来，如果是加速把成本做大、加速转移办学收益，也许将来会受到较多的管制。”董圣足如是说。

中国大学评论

目前除了文学奖外，201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已公布。尽管今年对诺贝尔奖得主的讨论出现了很多新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争议，但是和往常一样，国内又是一波舆情从教育、科技、文化、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质问”为什么目前斩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如此之少。

笔者没有研究过到底是哪些人群在“质问”为什么目前鲜有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只是觉得这种观点和目前社会中，质疑中国科技工作常见的观点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认为只发文章而没有成果转化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再比如认为发国际期刊有什么用。

然而，在科技史上推动重大成果诞生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研究者发自内心的兴趣。因此，如果要求科技成果须“有用”，就已经将很多研究成果扼杀在了萌芽阶段。另外，科技成果很难在没有学术交流的环境下诞生，如果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甚至都不去读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那要到哪里获得更便捷、更有效的学术交流渠道呢？如果没有充分的学术交流，怎么能够奢望有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产出呢？

所以，如果强调学术研究必须有用、贬低学术论文发表的价值，就很难期待有丰富多彩的科技成果的产出。如果贬低国际学术论文发表，就无法建立起通畅的学术交流环境，这会直接压抑科技的发展。基于上述逻辑，笔者认为一方面质疑中国目前诺贝尔奖少，一方面却又大肆对“无用”的学术论文，尤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污名化，是一种自相矛盾，是不懂科技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表现。

说到规律，笔者想到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拔苗助长”。很多国人用此来抨击目前很多教育机构让孩子超前学习的现象。笔者认为现在要求中国科技工作者大面积出诺贝尔奖级成果也是一种典型的“拔苗助长”的心态。因为诺贝尔奖的成果与其最终获奖具有相当的时间滞后效应。连爱因斯坦这样被各领域举世公认的独一无二的人物，其获得诺贝尔奖的时间都大大滞后于其获奖学说所提出的时间。屠呦呦老师获奖的时间同样远远滞后于其成果发表的时间。

因此，现在要求中国多获诺贝尔奖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脱离现实基础。因为在几十年前，中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是全面落后于国际顶尖水平的，当时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核心任务也并不在于追求国际领先与创新，而是要解决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与工程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追赶，虽然现在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突飞猛进，但是在很多高精尖领域，我们仍然达不到引领的水平。所以，可以预计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诺贝尔奖也很难花落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质疑为什么中国目前斩获的诺贝尔奖如此之少，不是一种拔苗助长的心态么？

熟悉诺贝尔奖历史的读者可能知道，虽然美国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的确是拿诺贝尔奖的大户，但是在二战之前，拿诺贝尔奖的美国籍科学家并不多，那个时候欧洲科学家才是诺贝尔奖的常客。而要知道早在19世纪90年代年代美国的经济就已经是全球第一了。

所以国人渴望更多中国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千万不能急躁与苛求，因为科技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急不来。真要急了，后果可能跟拔苗助长这个的结局一样，禾苗都枯死了。基于历史发展脉络和科技发展规律，笔者大胆预测，如果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能够达到世界第一，那么在2060年左右，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将呈现井喷之势。

当然，上述图景要真正实现，就要有针对性地制止对发表“无用”学术论文、发表国际论文的污名化，鼓励中国学者完全融入国际学术界，这样才有助于为更多的学者营造更好的研究氛围，才有助于更多的诺贝尔奖级科学成果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高考千万不能降低对基础自然科学的考核与选拔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才能保证中国科学家的规模与水平。只有在一定规模与水平的基础上，才会有一定的中国科学家脱颖而出最终斩获诺贝尔奖。没有足够的科学家人群作为支撑，诺贝尔奖的成果就是无源之水，奢望多获得诺贝尔奖就是痴人说梦。

与之相反，如果在高考改革过程中，大幅度降低了基础自然科学的考核与选拔要求，如果“学这么难的数理化有什么用”等反智言论继续甚嚣尘上，何谈中国科学家的名字能够经常出现在诺贝尔奖榜单上出现，中国的经济实力能够长久位于世界前列？

对「诺贝尔奖」的渴求不能拔苗助长

李锋亮

现场

创新回归现实 合作成就共赢

——2018 年国际大学生类脑计算大赛总决赛侧记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我们设计的面板简洁、操作简便，欢迎扫码下载”“在噪音背景下，我们也可以准确地识别、抓取目标”“输入图片可以作五言诗”……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罗姆楼的大厅内，一场路演正在进行。

这场路演是2018年国际大学生类脑计算大赛总决赛评审的一部分。本届大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学科研究院、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承办，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灵汐科技有限公司、IEEE清华大学学生分会协办，旨在推动类脑计算研究及其在各种领域的应用，鼓励大学生技术创新，通过实践提升专业技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关注类脑计算这一前沿创新技术领域。

“今年的参赛作品，相较于去年更‘类脑’。绝大多数作品与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基础科学，以及相关热点方向有着密切联系。”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主任黄铁军总结道。

各参赛团队联系实际和学术热点，用新奇的设计和精心的准备迎接挑战。大赛成为志同道合的选手们交流切磋的大舞台，点燃清秋时节清华园的气氛。

从实际问题中来

进入路演现场，各色的仪器、设备摆在桌前，一辆在地面模型轨道上飞驰的火车模型，引得众人驻足观摩。然而，重点并不在绕圈运行的模型上。

“我们的项目叫做基于类脑架构的双目联动凝视跟踪飞行平台。”团队成员、来自国防科技大学无人机集群感知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常远介绍道。

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进一步解释，所谓双目联动，即指两架无人机在相对地探测过程中基于类脑智能构架，实现协同跟踪定位。

“以地面上的正在运行的火车模型为探测目标，以人的双眼为例，如果我们用手挡住左眼，右眼在跟踪目标时，左眼实际上也在跟着右眼转向同样的方向。因此，当我们不再对左眼进行遮挡时，它同样能够和右眼一样及时捕捉到目标。”常远说，双目联动凝视跟踪飞行平台原理也是如此，当其中一架无人机丢失目标后，可通过与另

一架无人机的联动，及时找回目标。

而这一设计灵感，来源于常远和同学平时实时进行无人机集群实验时遇到的问题。

“我们去年一年都在外面利用无人机做实验。在实验中，我们发现无人机在跟踪地面目标时很容易丢失目标。我们就想，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产生了如今的设计。”常远说。

就在离常远团队不远的另一个展位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大四生彭煦潭正在为评委介绍团队作品——基于深度学习的轻量化音乐质感转换系统。他们的设计灵感同常远团队一样，也来源于实际生活中的困扰。

“我平时也很喜欢剪视频、配音效，但是现在很多音效制作软件都很专业化，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操作困难、不便利，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那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不能设计一种更简便的方法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呢？于是就设计了这个作品。”彭煦潭说。

到实际问题中去

从实际问题中得来的设计思路和灵感，最终又要往哪里去呢？

在国际大学生类脑计算大赛的平台上，选手们用设计的项目告诉我们，设计最终要到实际问题中去。

在上海交通大学团队的展位里，一名队员戴着一副奇特的眼镜正在为参观者讲解他们的参赛作品——基于脑电和眼动信号的多模态情绪识别系统。

“我们项目的长期目标就是辅助抑郁症治疗，现在抑郁症的发病率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但是识别率却很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研究生赵黎明介绍道。

在过去，脑电会被用于进行疲劳测试或简单的生理特征分类上，而传统的情绪分类经常采用图像和音频的方式，很容易造假，因为抑郁症患者往往不愿意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相比之下，脑电和眼动对于情绪的识别准确率更高”。

赵黎明表示，在医学上对于情绪识别系统是有需求的，目前他们已经在与相关医院单位合作，将设计项目进一步运用到实际中。

同样在医学上发力的还有清华大学团队的基于CNN与SNN混合的肝脏肿瘤区域识别与分割这一作品。该项目实现了对肝脏的CT/MRI图像进行自动轮廓划分、肿瘤区域识别与分割，并且可以使用VR对分割结果进行三维展示，为医生的术前规划和教学工作提供便利。

“该算法在小于1分钟的时间内可完成医生两小时的工作量，有望在术前规划环节大幅提升普通医生工作效率和准确率。”团队成员介绍道。

目前，团队已经在积极进行科研成果向临床的转化，在北京、西安、秦皇岛等城市，均有合作医院和单位。

团队配合有力量

经过两天赛程的激烈角逐，大赛评出了优秀奖励队伍6支、三等奖4支、二等奖3支、一等奖2支，以及一支特等奖队伍。

在众多参赛队伍中，来自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参赛作品——基于情境信号的连续多任务学习脱颖而出，摘取了本届大赛的特等奖，收获了3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颁奖典礼后，中科院自动化所团队的成员们在台下显得安静而放松。队员表示，作品的设计过程会遇到很多困难，要进行反复修改，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找到对的研究问题，起点往往会决定成果；此外便是团队合作。

“合作很关键，我负责理论方面的问题，另一



决赛路演现场

个学弟实践很强，主要负责算法的设计和实现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相互促进。以前没有过两人配合的工作，通过这次尝试，我也学到了很多。”团队成员感慨道。

对于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各支参赛队伍的成员都深有感触。

来自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的胥铭和张辰也是两人组成的队伍。路演中场休息时，他们只能轮流休息，张辰给还在为记者讲解的胥铭送来一杯饮料。

“我们的作品是基于强化学习的古诗生成系统，文理交叉，数据分析很辛苦，还要弄清楚格律、意象等问题。偶尔也会通宵，但是不会天天熬夜，身体会受不了的。”胥铭笑道。

两人经过共同努力，最终获奖而归。

“在团队中，我更愿意成为一名积极的协调者。不同人擅长的不一样，协调队员，发挥所长、互相配合是很重要的。”常远说。他所在的队伍也在决赛中取得二等奖的好成绩。

本届比赛圆满落下了帷幕，期待更多的“类脑”挑战者和创新者，在国际大学生类脑计算大赛上展示自己的风采。